

(22)

G311 Ex.

绝密

中发〔1972〕25号文件附件

Nº 0433659

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
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

一九七二年七月

目 录

一、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一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 (1) 陈伯达一九二五年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
发表的《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
反共文章(节录).....(1)
- (2) 陈剑垣的证明材料.....(2)
- (3) 罗明的证明材料.....(4)
- (4) 许曼的证明材料.....(6)
- (5) 杨文生的证明材料.....(8)
- (6) 李黎洲的证明材料(节录).....(10)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
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 (1) 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写给河北省委的《怎样
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节录).....(11)
- (2) 陈伯达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太白》半月刊上
发表的宣扬托派思想的文章《殷周社会略
考》(节录).....(12)

(3) 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破坏我党地下机关所得的关于陈伯达托派问题的材料.....	(13)
(4) 托派分子万志凌的交代.....	(14)
(5) 陆玉的交代.....	(17)
(6) 黎琴南的交代.....	(19)
(7) 于甦的揭发.....	(21)
(8) 帅孟奇的交代.....	(23)
(9) 鲁也参的揭发.....	(24)
(10) 潘树人的交代.....	(25)
(11) 托派头目杜畏之的亲笔供词.....	(26)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1) 伪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主任解方的亲笔供词.....	(31)
(2) 特务总队帮审侯天铎的亲笔供词.....	(34)
(3) 特务总队侦缉士陈新亚的亲笔供词.....	(37)
(4)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伪天津市公安局破坏我地下党组织的“请奖表”(节录).....	(39)
(5) 同案人刘宁一的交代.....	(40)
(6) 一九三一年九月天津《大公报》和北平《世界日报》关于陈伯达等人被押解北平的报导.....	(44)
(7) 邱中复的证明.....	(45)
(8) 一九三二年远锐写给河北省委的	

意见书(节录).....	(47)
四、陈伯达出狱之后，写了一系列文章， 积极进行反共宣传	
(1) 陈伯达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写的鼓吹卖国主 义的《论谭嗣同》(节录).....	(49)
(2) 陈伯达一九三六年在《国防文学论战》上 发表的反共文章(节录).....	(50)
(3) 陈伯达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鼓吹“国防 哲学”和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反共文章.....	(51)
(4) 陈伯达一九三八年抛出的反共纲领《三民 主义概论》	(52)

一、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一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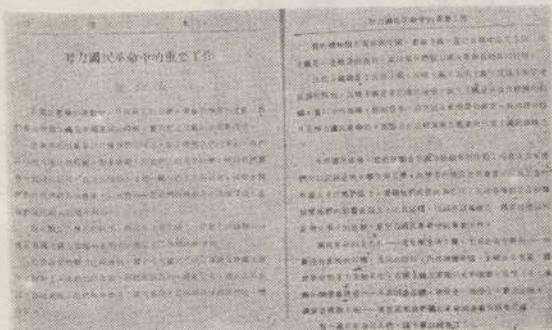
(1) 陈伯达一九二五年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发表的《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反共文章(节录)

現在國中思想界的妖怪，概括言之有三種：一便是亡清餘孽，一便是帝國主義及軍閥的走狗，一便是走入迷路的糊塗蟲。

亡清餘孽的勢力已經薄弱，最△足置處的，便是軍閥及帝國主義的走狗與走入迷路的糊塗蟲。前則詭計百出，擾亂是非，後則盲目胡言，自送死地。我們如果要努力國民革命，這兩種妖怪都該把他一掃而空。

凡是努力國民革命的，都該立在這較為適合國情的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

陈伯达写的反共文章的全文和《洪水》杂志第一卷合订本上的勘误表



正	表
不會	勘
外人	誤
做錯	行
最足	一九
將來	五
最足	一九
將來	一〇
最足	一七
將來	二一
最足	二

注：①陈伯达在文中说的“走入迷路的糊塗蟲”，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他所说的“盲目胡言，自送死地”，要把这种“妖怪”“一扫而空”，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②文中△处“最不足”，《洪水》杂志已在第一卷合订本90页更正为“最足”。

(2) 陈剑垣的证明材料

陈尚友参加过孙文主义学会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我在福州秦望山家里谈起
龙溪情况时秦望山说先烈林家陈尚友
大约在一九二五年在厦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
成立时曾有表过宣言。宣言表是陈尚友到福
州秦望山说一九二六年张作霖任国民党汕头
军部军政处长时陈尚友任过军部秘书。

一九二六年我和许曼陈尚友都在厦门中山
大学读书当时校学生左右两派斗争很激烈
校长邹鲁保国民党右派(即西山会议派)。这时
陈尚友和福建右派骨干学生黄振家(邹鲁保的内线)
等拥护邹鲁反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联共扶助农
工三大政策打击左派学生因此我们左派学生
称陈尚友为右倾大右派。

陈剑垣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一日

注：①陈剑垣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中大”读书时，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现在福建。②陈尚友即陈伯达。③据陈伯达交代，黄振家是他一九二五年参加国民党的介绍人。已死。④秦望山已死，梁龙光、张余生现在海外。

陈剑垣的证明材料影印件原文

陈尚友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我在福州秦望山家里，谈论旧友梁龙光情况时，秦说梁龙光、黄振家、陈尚友大约在一九二五年在厦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立时曾发表过宣言，这宣言是陈尚友主稿的，秦还说一九二六年张余生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委员时，陈尚友任过党部秘书。

一九二六年我和许曼、陈尚友都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当时该校学生左右两派斗争很激烈，校长邹鲁系国民党右派（即西山会议派），这时陈尚友和福建右派骨干学生黄振家（邹鲁得意门生）等拥护邹鲁，反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打击左派学生，因此我们左派学生称陈尚友为右倾分子。

陈 剑 垣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一日

(3) 罗明的证明材料

揭发陳尚友的反共活动

我於一九三五年在廣東大學開始认识陳尚友，他与国民党右派过江投机家黎龍光劉蘭民等混在一起政治思想言论很反动，有一次，陳尚友与示威游行学生數人挑拨造謠我是共产党员，他的谈话是要毒攻共产党和左派，由此可知陳尚友是国民党右派。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廣東黨團區委派我到廈門招權農民讲习所学员並帮助当地党團發展組織，三月中的陳尚友策劃和组织六名国民党右派在春生堂对共产党进行攻击和恫吓有准备有计划的对共产党进行恶意围攻。他第一质問我廈門有何佈、詔和阴谋；第二质問我是不是“庐布”党有何政治主张；第三质問我为何还不用廈耕？质問我懂不懂俄国是什么国家；他们污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污蔑中国共产党是布党，要搞火燒動中中資本家反革反共反群革命，还胡说美國和菲律宾很民主很好等等。陳尚友在辯論激烈時从中共插几句话，指點他们向我開炮。

罗明(罗善培) 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

注：罗明当时是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往厦门地区的特派员，现在广州。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

罗明的证明材料影印件原文

揭发陈尚友的反共活动

我于一九二五年在广东大学开始认识陈尚友，他与国民党右派学生黄振家、梁龙光、刘鞠民等混在一起，政治思想言论很反动，有一次，陈尚友与厦门籍学生数人，找我谈话，指责我是共产党员，他们谈话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和左派，由此可知陈尚友是国民党右派。

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我到厦门招收农民讲习所学员并帮助当地党团发展组织，三月中旬，陈尚友策划和组织六、七名国民党右派在春生堂对我进行攻击和恫吓，有准备有计划的对我进行恶意围攻。他们第一质问我来厦门有何任务、企图和阴谋；第二质问我是不是“庐布”党，有何政治主张；第三，质问我为何还不回广州？质问我懂不懂俄国是什么国家？他们污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失败，污蔑中国共产党是“庐布”党，恶意煽动中小资本家反苏反共反对革命。还胡说美国和菲律宾很民主很好等等。陈尚友在辩论激烈时，从中插几次话，指点他们向我围攻。

罗明(罗善培)

一九七一年六月五日

(4) 许曼的证明材料

陈尚友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反共活动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十月，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七、八月间，在“中大”参加 C.P.

一九二六年陈尚友也在“中大”学习。当时校长邹鲁是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陈尚友和黄振家（邹鲁的得意门生）、付仁山等右派学生拥护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居心不测，企图消灭国民党”、“苏俄包藏祸心等等。我们看出陈尚友的思想反动，都不愿和他多接触。有一天“中大”的“孙文主义学会”学生和“中大”C.P.为一件什么事，双方打起架了，“孙文主义学会”派的人被打伤。陈尚友来到我们的宿舍，谈话中谈到这件事了，他就破口大骂，说我们都是“领苏俄津贴的卢布客”、“可鄙”。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

许曼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

注：①许曼当时是中共党员，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中大”因参加托派被开除党籍，现在福建。②付仁山已死。③“C.P.”即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许曼的证明材料影印件原文

陈尚友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反共活动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十月，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七、八月间，在“中大”参加 CP。

一九二六年陈尚友也在“中大”学习。当时校长邹鲁是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陈尚友和黄振家（邹鲁的得意门生）、付仁山等右派学生，拥护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居心不测，企图消灭国民党”、“苏俄包藏祸心”，等等。我们看出陈尚友的思想反动，都不愿和他多接触。有一天“中大”的“孙文主义学会”学生和“中大”CP 为一件什么事，双方打起架了，“孙文主义学会”派的人被打输。陈尚友来到我们的宿舍，谈话中谈到这件事，他就破口大骂，说我们都是“领苏俄津贴的‘卢布客’”、“可鄙”。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

许 曼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

(5) 杨文生的证明材料

陳尚友反对左派学生的活动

一九二六年我从永春到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陳尚友也在那里。他与永春籍右派学生的头头黄振家很要好。黄叫他做什么事，他都照做。他还在閩南学生中罵共产党员是“盧布客”。

一九二六年間在广州中山大学里，許曼（許世忠）、楊世宁和我，商量着要组织一些左派的閩籍学生，在假期回乡做些立傳、组织青年、工农群众的工作，发起组织了一丁《福廈革命青年团》，並出版了一种刊物，名叫《朝阳》。陳尚友曾来我们的出版所吵鬧說我们不能用“福廈”二字，胡說我們不能代表全福廈的学生。可見他是一丁国民党的右派。

楊文生（楊邦厚）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

注：杨文生一九二六年参加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曾因参加托派被开除党籍，现在福建。

杨文生的证明材料影印件原文

陈尚友反对左派学生的活动

一九二六年，我从永春到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陈尚友也在那里。他与永春籍右派学生的头头黄振家很要好。黄叫他做什么事，他都照做。他还在闽南学生中骂共产党员是“卢布客”。

一九二六年间在广州中山大学里，许曼（许世忠）、杨世宁和我，为着要组织一些左派的闽籍学生，在假期回乡做些宣传、组织青年、工、农群众的工作，发起组织了一个《福建革命青年团》，并出版了一种刊物，名叫《朝阳》。陈尚友曾来我们的出版所吵闹，说我们不能用“福建”二字，胡说我们不能代表全福建的学生。可见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右派。

杨文生（杨邦彦）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

(6) 李黎洲的证明材料（节录）

陳尚友在張貞部隊任職的一些情況

我和陳尚友是一九二七年初在福州認識的，當時我在國民黨福建省委員會籌備處任籌備委員，陳尚友在張貞所統率的獨立第四師師部任秘書，兼任東路軍在福州所設的軍事幹部學校政治教官，少校軍銜（或中校）。他在这个軍事幹部學校任教官時，除自己教課外，對校內課程安排還負有相當責任。

李黎洲 1971.6.11.

影印件原文

陳尚友在張貞部隊任職的一些情況

我和陳尚友是一九二七年初在福州認識的，當時我在國民黨福建省委員會籌備處任籌備委員，陳尚友在張貞所統率的獨立第四師師部任秘書，兼任東路軍在福州所設的軍事幹部學校政治教官，少校軍銜（或中校）。他在这个軍事幹部學校任教官時，除自己教課外，對校內課程安排還負有相當責任。

李黎洲 1971.6.11.

注：①張貞是國民黨反動軍隊獨立第四師的師長。陳伯達在該師師部任秘書時，月薪白洋一百六十元。陳曾為張貞起草反動文告，頗得張貞賞識。②東路軍的軍事幹部學校系反動軍閥何應欽所辦。③李黎洲一九五八年因與美蔣特務勾聯，被我政府逮捕，判刑八年，現在福建。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1) 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写给河北省委的《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节录）

六、结尾

苏区各地革命的深入，与白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是目前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保障，然而这还不是绝对的保障，绝对保障还是要依赖于几个中心城市以至于全国的革命胜利，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责任是异常艰难，繁重，曲折而苦痛的，小心翼翼的日常地去考察一切革命工作的错误与正确，弱点和优点，以改进工作以推动工作前进，则更容易成为我们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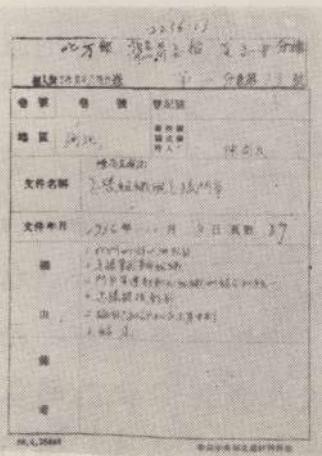
职 陈尚友 九日成 〇四〇年十月七日抄。

影印件原文

六、结尾

苏区各地革命的深入，与白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是目前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保障，然而这还不是绝对的保障，绝对保障还是要依赖于几个中心城市以至于全国的革命胜利，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责任是异常艰难，繁重，曲折而苦痛的，小心翼翼的日常地去考察一切革命工作的错误与正确，弱点和优点，以改进工作以推动工作前进，则更容易成为我们的责任。

职 陈尚友 九日成
十月七日抄。



注：陈伯达在“意见书”中，公然宣扬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的托派观点，妄图否定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陈伯达的这个意见书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2) 陈伯达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太白》半月刊上发表的
宣扬托派思想的文章《殷周社会略考》(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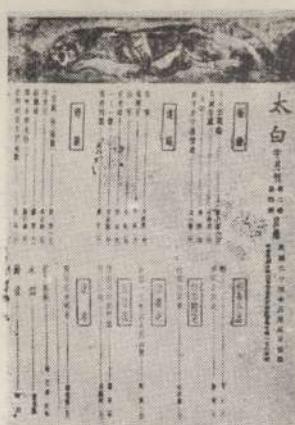
中國並沒有發現奴隸社會的階段，但正是中國空有了奴隸生產方法的階段，因而中國歷史缺乏了農業和手工業強大分工的前代遺產，這是造成了後來中國封建生產方法及其社會細胞——農業與手工業的家庭結合得畸形的堅固之一個重要的前提，造成了中國社會停滯狀態之一個重要的前提。

無論是从地下的發掘，或古代遺下最可靠的文書，我們還沒有發現出中國曾由氏族社會轉化為奴隸社會之歷史的存在。對於殷代，我們所能證實的，還只是由氏族社會剛脫胎出來的原始封建社會。我們知道直至殷代，鐵還未曾參加生產的領域。杜渝白有個意見，以為這實由殷人居處的地帶缺乏鐵的存在，這意見是值得注意的。

殷周社會略考

陳伯達

社
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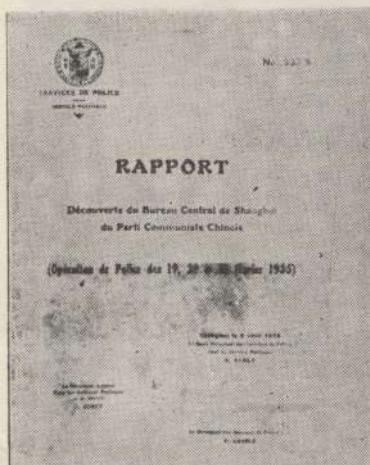
注：陈伯达在这篇反动文章中，宣扬苏联托派头子拉狄克和中国托陈取消派陈独秀等人关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阶段的托派思想，否认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除此文外，他还在《春秋战国社会略考》、《研究中国社会史方法论的几个先决问题》、《中国社会停滞状态的基础》等文章中，继续宣扬这种托派思想，顽固地坚持他的托派立场。

(3) 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破坏我党地下机关所得的关于陈伯达托派问题的材料

M. CHENG CHANG YU (陈尚友) (BORINOFF), originaire du Fujian fils d'un professeur, membre du Kuomintang, en 1924. T'affilia a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en 1927. Put envoyé à Pékin en octobre de la même année. Fit l'objet d'un avertissement, pour ses relations avec les trotskistes. Mais on lui permit toutefois de travailler aux organes subalternes (renvoyé en Chine).

影印件译文

233、陈尚友(巴里诺夫——BORINOFF)，福建人，教授的儿子，1924年是国民党员，1927年入党，同年10月派往莫斯科，因与托派有关系而受到警告，党决定：应去次要的部门工作(已送回中国)。



封面译文

巡捕房
政治科

报告

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局之发现
(1935年2月19、20和21日的警察行动)

政治和保安科
科长帮办
R·约勃士

上海，1935年4月8日
巡捕房副监督
政治科科长
R·沙赫利

巡捕房监督
P·加衣勃勒

(4) 托派分子万志凌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见16页)

陈尚达参加托派组织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去莫斯科学习。同路约二百人中有陈尚友（即陈伯达）。十一月进校，我和他同年一年级第二班。二八年，东大中国科并入中大，其中有我在国内认识的王文元，他给我看了一些反对斯大林和联共党中央的托派文件，并动员我参加了托派组织。我阅读过程中，把这些文件也给陈尚友看了。当然，那时在校内传阅托派文件很危险，如果不是我们比较接近共产国际，对校内的派别斗争观察莫相同，如果没有在他看后不会向组织报告类地把搞清楚我是不敢给他看的。经他看后的，还是叫他同意托派的观察，并在这个基础上参加了托派组织。在他看了这些文件后，他没有提出过与托派观察相反的意见，从初先的默认到最后的完全同意。

我把王文元向我宣传的观莫也向陈尚友讲了。这些观莫是：在一个国家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观莫；联共党内派别斗争复杂，宣扬托洛茨基的“功勋”；并对伟大列宁主义的斯大林肆意歪曲了。陈尚友听了也完全同意。二九年四、五月间我参加了托派，原

是五人小组成员。这时孙征求了陈尚友参加托派的意愿，虽然他表示要挤出时间读书，但仍坚决表示愿意参加托派。此后孙将此事告诉了五人小组，并由孙和他联系。

二九年暑假前，托派组织为筹集活动经费，在内部进行捐款，陈尚友也拿出了二、三个卢布，由孙收存后交给五人小组。三〇年二月孙被捕，九月于流放前回校过夜，在走廊上遇见陈尚友，他赠送孙五十卢布表示同情。五六回国后，听于魁说陈仲达就是陈尚友，找孙谈他写了一信，争取他的帮助，但未得复。

关于我发展陈尚友参加托派的事，王国外学对于魁、潘树人、鲁世琴谈过；五六回国后立于魁家又对他们三人重说过。关于这件事，陈玉也不知道。

万志凌一九八一

注：万志凌一九二九年是莫斯科“中大”托派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一九三〇年万志凌在苏联被逮捕流放，一九五六年被释放回国。现在农林部“五·七”干校。

托派分子万志凌的交代影印件原文

陈伯达参加托派组织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去莫斯科学习。同路的约二百人中有陈尚友（即陈伯达）。十一月进校，我和他同在一年级的第二班。二八年，东大中国部并入中大，其中有我在国内认识的王文元，他给我看了一些反对斯大林和联共党的托派文件，并动员我参加了托派组织。我阅读过程中，把这些文件也给陈尚友看了。当然，那时在校内传阅托派文件很危险，如果不是我们比较接近和互相了解、对校内的派别斗争的观点相同，如果没有在他看后不会向组织报告的把握，当然我是不敢给他看的。给他看的目的，就是叫他同意托派的观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参加托派组织。在他看了这些文件后，他没有提出过与托派观点相反的意见，从初先的默认到最后的完全同意。

我把王文元向我宣传的观点也向陈尚友讲了。这些观点是：在一个国家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联共党内派别斗争情况；宣扬托洛茨基的“功勋”；并对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斯大林肆意歪曲等等。陈尚友听了也完全同意。二九年四、五月间我参加了托派，曾是五人小组成员。这时我征求了陈尚友参加托派的意见，虽然他表示要挤出时间读书，但仍坚决表示愿意参加托派。此后我将此事告诉了五人小组，并由我和他联系。

二九年暑假前，托派组织为筹集活动经费，在内部进行捐款，陈尚友也拿出了二、三个卢布，由我收取后交给五人小组。三〇年二月我被捕，九月于流放前回校过夜，在走廊上遇见陈尚友，他赠送我五十卢布表示同情。五六年我回国后，听于甦说陈伯达就是陈尚友，我曾给他写了一信，争取他的帮助，但未得复。

关于我发展陈尚友参加托派的事，在国外曾对于甦、潘树人、鲁也参谈过；五六年回国后在于甦家又对他们三人重说过。关于这件事，陆玉也知道。

万志凌

七一、九、八

(5) 陆玉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见下页)

，关于陈尚友托派问题的交代

1927—1930年我在莫斯科中大(中共劳大)学习期间，曾和万志凌、陈尚友一起进行过托派活动。1931年回国后，我又在上海托派中央工作。现将陈尚友在莫斯科中大的托派罪行交代如下：

我在莫斯科中大时，和万志凌是夫妻。陈尚友是万志凌的同班要好的同学，彼此无话不谈。有一次，我们一起谈话，陈尚友和万志凌曾诽谤“斯大林是官僚主义”。还有一次，万志凌用托洛斯基的反动理论，谈对一个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陈尚友表示完全同意万志凌的看法。

1929年5月，万志凌参加托派后，为了拉我加入托派，曾将托派社署信函的攻击斯大林的文件给我看过。我看文件时间万，陈尚友是否看过？万说，给他看过，并告诉我说“陈尚友的看法和我们一样。”在万志凌的灌输和影响下，陈尚友和我都接受了托派的观感和立场，成为托派分子。那时，万志凌、陈尚友和我是有托派组织关系的，才是小头目。

万志凌被捕前，子威形容不好，曾在学校俱乐部门口对陈尚友和我说，今后我们互相联络要注意一些，不要一见面就凑在一起。嘱咐我们，有事由他告知我或陈尚友，然后我和陈再联络，要吸取广西派的经验，隐蔽一些。

万志凌被捕后，陈尚友曾对我说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能把犯

思想错误的学生随便逮捕呢？这简直是恐怖政策！他还诬蔑斯大林是独裁专制。他还告诉我说“一切活动，目前暂时停止了。要隐蔽些。”

1930年底，陈尚友回国前夕，又找过我，说没有钱，我给了他五个卢布。

陆玉（原名胡佩文）1971.9.9

影印件原文

关于陈尚友托派问题的交代

1927—1930年我在莫斯科中大（中共劳大）学习期间，曾和万志凌、陈尚友一起进行过托派活动。1931年回国后，我又在上海托派中央工作。现将陈尚友在莫斯科中大的托派罪行交代如下：

我在莫斯科中大时，和万志凌是夫妻。陈尚友是万志凌的同班要好的同学，彼此无话不谈。有一次，我们一起谈话，陈尚友和万志凌曾诽谤“斯大林是官僚主义”。还有一次，万志凌用托洛斯基的反动理论，谈到一个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陈尚友表示完全同意万志凌的看法。

1929年5月，万志凌参加托派后，为了拉我加入托派，曾将托派秘密传阅的攻击斯大林的文件给我看过。我看文件时间万，陈尚友是否看过？万说，给他看过。并告诉我说“陈尚友的看法和我们一样。”在万志凌的灌输和影响下，陈尚友和我都接受了托派的观点和主张，成为托派分子。那时，万志凌、陈尚友和我是有托派组织关系的，万是个小头目。

万志凌被捕前，予感到形势不好，曾在学校俱乐部门口对陈尚友和我说，今后我们互相联系要注意一些，不要一见面就凑在一起。嘱咐我们，有事由他告知我或陈尚友，然后我和陈再联系，要吸取广西派的经验，隐蔽一些。

万志凌被捕后，陈尚友曾对我说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能把犯思想错误的学生随便逮捕呢？这简直是恐怖政策！他还诬蔑斯大林是独裁专制。他还告诉我说“一切活动，目前暂时停止了。要隐蔽些。”

1930年底，陈尚友回国前夕，又找过我，说没有钱，我给了他五个卢布。

陆玉（原名胡佩文）1971.9.9

注：陆玉，托派分子万志凌前妻，现在广西。

(6) 黎琴南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见下页)

我所知陈尚友的一些托派情况

一九二九年三月我到莫斯科中苏劳大(前身是中山大学)学习，曾参加过托派组织，先后和陈尚友有过接触，了解他的一些情况，交代于下：

一九二九年四月学校举行选举大会时，陈尚友等托派分子暗中鼓动我班的程郑读(真名已忘记)、郑洁清、黄政宜生先涌入会场，占据前排座位，控制会场，陈尚友一伙在楼上鼓噪助威，进行捣乱。

新生入学后，陈尚友即利用同乡关系与指导读苏联办法，对我班两个福建学生程郑读、郑洁清施加影响，将他们收进的托派组织全集及拉狄克的中国史书送给程郑读，逐步将其拉入托派。暑假期间，学校要把托派骨干分子方志凌等人送往西伯利亚时，陈尚友向程郑读人力主新生系主任面阻止。开学开枪后，陈尚友见势不妙，指示程郑读注意隐蔽，程并把这转告我，要我不要再往前冲了！

黎琴南 1971年9月4日

注：黎琴南原名黎晴岚，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时，曾因托派罪被捕，一九三一年回国。一九五二年因托派罪被捕，一九五七年释放，现在湖南。

黎琴南的交代影印件原文

我所知陈尚友的一些托派情况

一九二九年三月我到莫斯科“中共劳大”（前身是“中山大学”）学习，曾参加过托派组织，先后和陈尚友有过接触，了解他的一些情况，交代于下：

一九二九年九月间学校举行党员大会时，陈尚友等托派分子暗中鼓动我班的程“小孩”（真名已忘记了）、郑洪涛等各班新生尽先涌入选举，占据前排座位，控制会场，陈等一伙在楼上鼓噪助威，进行操纵。

新生入学后，陈尚友即利用同乡关系与指导读书等办法，对我班两个福建学生程“小孩”和郑洪涛施加影响，将他所收藏的托洛斯基全集及拉狄克的“中国史”等书给程、郑阅读，逐步将其拉入托派。暑假期间，学校要把托派骨干分子万志凌等人送往西伯利亚时，陈唆使程、郑等人力主新生各班出面阻止。清党开始后，陈尚友见势不妙，指示程、郑等注意隐蔽，程并把这事转告我，要我“不要再往前冲了！”

黎琴南

1971年9月4日

(7) 于魁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见下页)

揭发陳伯達的托派问题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从劳改营释放后，在沃尔古塔曾有个时期与万志凌同住一个房间，有一次万讲他老婆也是反对派，是他介绍她参加的。万讲：我是暴露了可是秘密三人小组其他二人就没有被暴露，这两个人，一个是我的老婆，另一个是陳伯达。我被暴露后，陳对我说过，已暴露的人就无法办了，没有暴露的人以后再不能暴露，陳讲他回国后是不会暴露的。

在万志凌回国后大约在一九五六年，我到万志凌家，当谈到陳伯达时，我问万是不是你讲的那个三人小组的陳伯达，万讲是我又问是不是寄“四大家族那本戈”的陳伯达，万讲就是他。在万志凌党籍未解冻前，我曾建议万给陳伯达写封信，我对方讲，陳是你三人小组的成员，他是了解你的，他一定会帮忙的。万同意了我的意见，给我写了信。以后我同过万数次，万讲陳来给他回信也来找过他。陳的托派问题魯也參、潘樹人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前陳伯达的托派问题我曾向周益奇等人談过。文化大革命中，我又向原林地部軍管会王云主任等同志谈过陳的托派问题。

于魁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

注：于魁一九三三年去苏联学习，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与万志凌一起在苏联沃尔古塔流放，一九五五年回国。现在农林部“五·七”干校。

于甦的揭发影印件原文

揭发陈伯达的托派问题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从劳改营释放后，在沃尔古塔曾有个时期与万志凌同住一个房间，有一次万讲他老婆也是反对派，是他介绍她参加的。万讲：我是暴露了，可是秘密三人小组其他二人就没有被暴露，这两个人，一个是我的老婆，另一个是陈伯达。我被暴露后，陈对我说过，已暴露的人就无法了，没有暴露的人，以后再不能暴露，陈讲他回国后是不会暴露的。

在万志凌回国后，大约在一九五六年，我到万志凌家，当谈到陈伯达时，我问万是不是你讲的那个三人小组的陈伯达，万讲是。我又问是不是写“四大家族”那本书的陈伯达，万讲就是他。在万志凌党籍未解决前，我曾建议万给陈伯达写封信，我对万讲，陈是你三人小组的成员，他是了解你的，他定会帮忙的，万同意了我的意见。给陈写了信，以后我问过万数次，万讲陈未给他回信也未找过他。陈的托派问题鲁也参、潘树人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的托派问题我曾向帅孟奇等人谈过。文化大革命中，我又向原林业部军管会王云主任等同志谈过陈的托派问题。

于 鬼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

(8) 帅孟奇的交代

1958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曾找于甦谈过话，于甦向我反映了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期间，参加了托派。谈话间，有人进来，没有再谈下去。后来，我没有继续追问此事，也没有向组织上反映。

帅孟奇

1971年3月23日

影印件原文

1958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曾找于甦谈过话，于甦向我反映，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期间，参加了托派。谈话间，有人进来，没有再谈下去。后来，我没有继续追问此事。也没有向组织上反映。

帅孟奇

1971年3月23日

注：帅孟奇原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9) 鲁也参的揭发

关于万志凌对我讲过陈尚友在“中大”是托派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夏天某日在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郊区杨革佑儿镇，在我和万志凌的闲谈中，万曾对我说：“在依凡诺夫自由充军时一个别名叫‘小孩子’（万当时说过此人的真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跳伏尔加河自杀了。”同时万志凌说：“‘小孩子’是陈尚友的同乡。”于是问我：“陈尚友是谁？”万说：“陈尚友回国去了，我和他是同班，他是班上托派小组织的成员，我是班上托派小组组长。”关于“小孩子”、陈尚友我都不相识，因此，详细情节没细问。

鲁也参
一九七一、八、十三

影印件原文

关于万志凌对我讲过陈尚友在“中大”是托派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夏天某日在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郊区杨革佑儿镇，在我和万志凌的闲谈中，万曾对我说：“在依凡诺夫自由充军时一个别名叫‘小孩子’（万当时说过此人的真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跳伏尔加河自杀了。”同时万志凌说：“‘小孩子’是陈尚友的同乡。”于是问我：“陈尚友是谁？”万说：“陈尚友回国去了，我和他是同班，他是班上托派小组织的成员，我是班上托派小组组长。”关于“小孩子”、陈尚友我都不相识，因此，详细情节没细问。

鲁也参

一九七一、八、十三

注：鲁也参一九四八年曾和万志凌同在苏联塔什干城杨革佑儿镇流放，一九五五年回国。现在北京。

(10) 潘树人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关于我所了解的陈伯达的托派问题

關於我所了解的陈伯达的托派问题
我于1928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劳大留学期间，曾加入过该校托派组织，因此曾被捕流放到阿尔枯达，在那里我认识了于甦，遇着了过去相识的托派分子傅学礼、万志凌。1935年我回国后，又和于甦、万志凌住在一起，彼此常见面，因此先后听到他们给我讲过一些有关陈伯达在苏联留学期间也参加过托派的问题。现在根据我的回忆，揭发如下：

1 我记得在1953年，我住在苏联沃尔枯达城热电站街10号时，以前莫斯科共产党大的托派分子傅学礼来我家串门，曾对我谈到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去苏联访问时率领的代表团中有陈伯达，并且说陈还是莫斯科共产党大的托派。

2. 约在1956年下半年，我在万志凌家，听万说，他因为掌管向墅，曾去信找陈伯达证明，陈不但未予答复，连万原信也不退回。下法官此事，颇为难堪。我当时问万：“陈伯达怎么会知道你，不知道你又如何能证明你？”万说：“他不行才知道，我们在莫斯科中共营大时是一个托派三人小组，我们互相天活不谈。”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于魁。万并且说他一定向中央反映。

3. 1968年春节期间,我去看望于魁,在阅读文化大革命运动时于魁在谈起赵毅敏、宋天梦人被掌掴了未果之后,又对我说:陈伯达也有问题。说陈过去是个托派。

潘树人 1971年7月30号

共派枯了志，因关托发
中托尔着万甦。有过揭
科校沃遇，于面些加忆
斯该到，礼和见一参回
莫过放甦学又常过也的
联入流于傅，此讲间我
苏加，了子后彼我期据
在曾捕识分国，给学根
年，被认派回起们留在
1928间，曾我托我一他联现
于学因那识1955住听在题，
我留大织，在相凌后达问
劳组达。过凌万此陈派如
下：

在住时，傅主的是毛子，率领号分到率陈年，街托我问且站的对访并派。1953电大曾联，托热劳，苏达的，在城共门，来伯太得达中串年陈劳记枯科家九有共我尔斯我四中中1.沃莫来九国科联前礼一表斯苏以学席代莫

万题，予及陈如知是话于
在问题未谈：“又不，无有映
我问但万万你何时，相还反
我籍但万万你何时，相还反
年，党不。问道如大互，央
半因为，退当不“共我场中向
下他明不我：中，在定
年，他证也。你说，说科组，时一
1956说，达信堪道。斯小当他
在万伯原难知？”莫人得说
在三记目
约，听找连颇么明们派我，并
家信，怎证我托。”万
凌去复事达能，个谈
志曾答此伯何道，一不胜

3.1968年谈毅，谈起之，于是在出问题，有

潘樹人

1971年7月30号

注：潘树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与万志凌一起在苏联沃尔古塔流放，一九五五年回国。一九七一年十月在北京病死。

(11) 托派头目杜畏之的亲笔供词

(影印件原文见 29 页)

关于陈尚友的托派活动

陈尚友和我的关系。陈尚友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学习时，我在他们班上作翻译，我和他是比较接近的。二人时常在一处交谈，观点一致。我一九三一年从莫斯科回国，一九三〇年被开除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参加托派。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托派遭受大破坏，我十二月逃往北京，继续传播托派思想，进行托派活动，勾结反红军闹孙殿英搞反革命军事投机，勾结共产党叛徒张慕陶，搞反党活动。对于我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托派分子，凡是站在共产党方面的人都不同我来往，肯和我来往的，只有叛党分子和脱党分子。陈尚友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曾三次和我会见。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春在北京前门外“永安会馆”他的住处。陈告诉我，他一九三一年被捕，是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师长强烈把他保释出来的。他正在写《论潭嗣同》。我把被开除党籍，参加托派等情况告诉了他。第二次见面是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北京景山西街我的家中。这次见面，陈尚友在我家吃了一顿饭。陈对我大加吹捧，说我的哲学论文写得很好，《自然辩证法》那本书译得很好等等。第三次见面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在天津一个旅馆中。当时，我以孙殿英代表的身份到天津参加张慕陶所搞的军事投机活

动。张墓陶告诉我陈尚友在天津并将陈的住处告诉我，叫我到陈家谈谈。这一次我同陈尚友主要是谈张墓陶这一伙人怎么办？我认为，张墓陶这伙人既然政治路线和中国共产党不同，就应当搞独立组织，另外成立一个党。陈尚友认为路数有分歧，但这伙人不应脱离共产党，只应成为党内一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在党内夺取领导权。据我记忆，这次见面时，陈尚友又谈到他的《治潭嗣同》，并提出请我为他这本书写一篇序。一九三五年陈尚友还对吴永祥（字持我）说我的哲学很有研究，懂得辩证法，介绍吴到我家看我。以上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陈尚友和我同属于中国托派这一流派。

关于陈尚友和张墓陶的关系。张墓陶也是一个托派，陈尚友就是“张墓陶派”中的一分子。一九三四年四月张墓陶一向我吹嘘，他手下有一帮人，主要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政治部工作过的那些人。陈尚友就是其中之一。张墓陶多次对我说：“王通（即陈尚友）学问很好，理论很好”。张是把陈尚友看作他的理论助手，当时我也是这样看待陈尚友的。我在北京的住处是张墓陶告诉陈尚友的。一九三四年四月陈尚友到天津，是张墓陶邀去的。我在天津和陈尚友见面谈话也是张墓陶安排的。张墓陶进行反党活动时那一套所谓“理论”，一部分是我提供的一部分就是陈尚友提供的。一九三五年秋张墓陶在太原搞小组时，自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派”。

显然就是按照陈尚友的主张办事的。

从陈尚友关于中国革命策略问题的观点来看，他也是一个托派。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陈尚友同我谈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时，他的意见大体和我一致。我们都强调城市工作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而忽视农村工作，对农村武装斗争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在抗日问题上，也看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作用。总结起来是，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这是托派的要害，是中国托派在三十年代的基本主张。

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看法，陈尚友也同托派一致。例如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这一阶段，也不承认中国有“亚细亚式的社会”，陈尚友所发表的文章就完全支持我的意见。

托派罪犯杜畏之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注：杜畏之又名杜沧白。杜于一九二八年由苏联回国，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参加托陈取消派，是这个反动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因托派罪被捕，现在押。

托派头目杜畏之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关于陈尚友的托派活动

陈尚友和我的关系。陈尚友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学习时，我在他们班上作翻译，我和他是比较接近的。二人时常在一处交谈，观点一致。我一九二八年从莫斯科回国，一九三〇年被开除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参加托派。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托派遭受大破坏，我十二月逃往北京，继续传播托派思想，进行托派活动，勾结反动军阀孙殿英，搞反革命军事投机，勾结共产党叛徒张慕陶，搞反党活动。对于我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托派分子，凡是站在共产党方面的人都不同我来往，肯和我来往的，只有叛党分子和脱党分子。陈尚友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曾三次和我会见。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春在北京前门外“泉漳会馆”他的住处。陈告诉我，他一九三一年被捕，是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师长张贞把他保释出来的。他正在写《论谭嗣同》。我把我被开除党籍，参加托派等情况告诉了他。第二次见面是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北京景山西街我的家中。这次见面，陈尚友在我家吃了一顿饭。陈对我大加吹捧，说我的哲学论文写得很好，《自然辩证法》那本书译得很好等等。第三次见面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在天津一个旅馆中。当时，我以孙殿英代表的身份到天津参加张慕陶所搞的军事投机活动。张慕陶告诉我，陈尚友在天津，并将陈的住处告诉我，叫我去同陈谈谈。这一次我同陈尚友主要是谈，张慕陶这一伙人怎么办？我认为，张慕陶这伙人，既然政治路线和中国共产党不同，就应当搞独立组织，另外成立一个党。陈尚友认为，路线虽有分歧，但这伙人不应脱离共产党，只应成为党内一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在党内夺取领导权。据我记忆，这次见面时，陈尚友又谈到他的《论谭嗣同》，并提出请我为他这本书写一篇序。一九三五年陈尚友还对吴承仕吹捧我，说我对哲学很有研究，懂得辩证法，介绍吴到我家看我。以上这

些事实就足以说明，陈尚友和我同属于中国托派这一流派。

关于陈尚友和张慕陶的关系。张慕陶也是一个托派，陈尚友就是“张慕陶派”中的一分子。一九三四年四月张慕陶曾向我吹嘘，他手下有一帮人，主要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政治部工作过的那些人，陈尚友就是其中之一。张慕陶多次对我说：“王通（即陈尚友）学问很好，理论很好”。张是把陈尚友看作他的理论助手，当时我也是这样看待陈尚友的。我在北京的住处是张慕陶告诉陈尚友的。一九三四年四月陈尚友到天津，是张慕陶邀去的。我在天津和陈尚友见面谈话，也是张慕陶安排的。张慕陶进行反党活动时那一套所谓“理论”，一部分是我提供的，一部分就是陈尚友提供的。一九三五年秋张慕陶在太原搞小组织时，自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派”，显然就是按照陈尚友的主张办事的。

从陈尚友关于中国革命策略问题的观点来看，他也是一个托派。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陈尚友同我谈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时，他的意见大体和我一致。我们都强调城市工作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而忽视农村工作，对农村武装斗争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在抗日问题上，也看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作用。总括起来是，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这是托派的要害，是中国托派在三十年代的基本主张。

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看法，陈尚友也同托派一致。例如，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这一阶段，也不承认中国有“亚细亚式的社会”，陈尚友所发表的文章就完全支持我的意见。

托派罪犯杜畏之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1) 伪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主任解方的亲笔供词

(影印件原文见33页)

关于王通被捕叛变问题

一九三一年三月到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任伪天津市公安局主任特务总队主任及任特务总队支。

一九三一年四月间，天津市的国民党特务侦察到河北省委书记兼租界墙河外集贤里省委机关的地址，要求市公安局协助逮捕。市公安局的特务第五队侦察到河北省委设在法租界“西北贸易公司”的机关，同时又会英法租界动手逮捕了省委书记许兰英，组织部长陈源道，秘书处刘善(?)、鸥、王通、史连甲等十余人。至总审讯时，他们都供认了自己的组织身份、活动内容并互相认述了别人的组织关系和组织活动。

从英和齐引渡到特务队的仅拖了多时间，我问帮审侯天铎为什么这些天还没有审完？侯说：这案子人多，材料还有些南辕北辙，唯恐不懂，以为通达外人是“熊色”，一向文供。于是他给了南方人说话权，我听不出来就让他这样就罢了时间啦。我模糊地记着侯天铎还说据市党部特务科长

和押解会逮捕的人说，王通胆很小，在赌场一被捕就吓破胆了。

总队初审完毕，由特审庭天铎起冲（合叫审判科的报告）告诉辩护上庭人的传问。我在传问中发现王通供认了组织反共集团：承认是共产党有组织反国民党，漫延至文化教育界活动，常写文章在报刊和公开刊物上登载。我模糊地记得他已供认为过刊物什么名称记不起了。王通还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善（？）即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等情况。

王天铎起冲的报告中除：不述为案的报擦逮捕的人数，初审的过程以外，没有写明从犯人传问转到受经过许兰芝、陈源道、刘善（？）即史连甲等三人之后，相互印证的情况未写，此案情节确凿，可以成立。英语。

由特务队将致，供词送到公案局司令科被审收，将陈源道刘善（？）即王通、史连甲廿年人送交北平军令会军法处了。

解方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

注：①解方又名解如川，一九三一年四月任伪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主任，是逮捕、审讯陈伯达一案的敌特主要负责人，现在押。②王通是陈伯达被捕后的化名。③许兰芝、陈源道已死，史连甲即刘宁一，刘善鸥应为刘一鸥即刘亚雄。

伪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主任解方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关于王通被捕叛变问题

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一九三五年六月，我在伪天津市公安局先任特务总队主任，后任特务总队长。

一九三一年四月间，天津市伪国民党部侦察到河北省委设在英租界墙子河外集贤里省委机关的地址，要求公安局协助逮捕。公安局与特务第五队侦察到河北省委设在法租界“西北贸易公司”的机关，同时照会英、法租界动手，逮捕了省委书记许兰芝、组织部长陈源道、秘书长刘善（？）鸥、王通、史连甲等卅余人。在总队审讯时，他们都供认了自己的组织身份、活动内容并互相认证了别人的组织关系和组织活动。

从英租界引渡到特务队以后拖了一个时间，我问帮审侯天铎为什么这些天还没有审完？侯说：这案子人多，其中还有些南蛮子，口音难懂，如王通这个人是个“熊包”，一问就供，可是他是个南方人，说话又文诌诌的，我听不出来就让他写，这样就费了时间啦。我模糊地记得侯天铎还说据市党部、特一队去英租界照会逮捕的人说，王通胆很小，在现场一被捕就“筛糠”了。

总队初审完毕，由帮审侯天铎起草给公安局长的报告并附上每个人的供词。我在供词中看到王通供认了组织关系：供认是共产党员，省委机关成员，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活动，常写文章在党刊和公开刊物上登载。我模糊地记得他还供认办过刊物，什么名称记不得了。王通还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善（？）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等情况。

在侯天铎起草的报告中，除了概述办案的根据、逮捕的人数、初审的过程以外，最后写明从每人供词特别是经过许兰芝、陈源道、刘善（？）鸥、王通、史连甲等重要人员相互印证的情况来看，此案情节确凿，可以成立。等语。

由特务总队将呈文、供词送到公安局司法科复审以后，将陈源道、刘善（？）鸥、王通、史连甲等卅余人送交北平军分会军法处了。

解 方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一日

(2) 特务总队帮审侯天铎的亲笔供词

(影印件原文见36页)

情况

一九三一年四月间，我生在天津市公安局侦缉总队当帮审时。有一天侦查一队陈新亚对我说：我们队长徐樹鋗前几天带人去会英部向由该局侦助，李英租界某发里办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把共产党河北省委书记机关，给破坏了。捕了十几个人（数目记不准）寄押在公安局拘役所，已由徐樹鋗讯问过了，由我保的他，等我整理好供词，就要送到总队。过了几天，他把案子送到总队，总队长解如川阅后交给我讯问。我就叫一队去讯问，由陈新亚保他，由组长桂望臣、侯海士、周子章、李少白把人带到，其中有个叫王通的年约30上下岁，南方口音，谈话有时听不太清，那省的人，我记不清了。向他时，他没有反抗，回答的很顺利。他说：某发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书记机关。他承认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并向他其他人物

况时，他谈：他历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很忙工作，有时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编写印制，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他谈的人名，我现忘记不得了。我察讯其他人时证明了互通电话的是实话。

我把这个案子要讯完了，汇报告了总队长解如川，他叫齐办公事，送省公安厅司法科，我就办好送秦文连同原供送司法科了。

后来侦缉一队，章报请奖时，由我案卷送司法科，以案得奖金元。

侯天铎 1971年2月17日

注：①侯天铎现住北京市，由群众监管。②徐树铭已被镇压。
③张璧臣、阎子峰已死。④侦缉总队即特务总队。

特务总队帮审侯天铎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一年我覆讯河北省委案子的情况

1931年4月间，我在伪天津市公安局侦缉总队当帮审时，有一天伪侦缉一队陈新亚对我说：我们队长徐树铭前几天带人照会英工部局由该局协助，在英租界集贤里办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把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给破坏了，捕了十几个人（数目记不准确）寄押在伪公安局拘留所，已由徐树铭讯问过了，由我录的供，等我整理好供词，就要送到总队。过了几天，他把案子送到总队，总队长解如川阅后，交给我覆讯。我就到一队去覆讯，由陈新亚录供，由组长张璧臣侦缉士阎子峰等分别把人带到，其中有个叫王通的年约30上下岁，南方口音，说话有时听不太清，那省的人，我记不清了。问他时，他没有反供，回答的很顺利。他说：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他承认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我问他其他人情况时，他说：他们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他说的人名，我现在记不得了。我覆讯其他人时证明了王通所说的是实话。

我把这个案子覆讯完了，即报告了总队长解如川，他叫我办公事，送伪公安局司法科，我就办好送案文连同原供送司法科了。

后来侦缉一队，汇报请奖时，由我汇总送到司法科，此案得奖数百元。

侯 天 锋

1971年2月17日

(3) 特务总队侦缉士陈新亚的亲笔供词

(影印件原文见下页)

一九三一年在英租界破获共党情况：

我於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在伪天津市公安局侦缉队当侦
缉士负责保供情报工作，还有时参加捕人和审讯。於一九三一年四月
由一隊隊長徐樹鈞指派會英工部局帶領隊員在英租界整理一回共產
黨事件。辦案前三天已派人化裝在集賢里附近尋視。捕獲十二三人
為了繼續捕人便將隊員卧底在陸續又捕五人所捕的人由
工部局引渡到偽公安局押在拘留所。

在一時由徐樹鈞和一隊隊附高松林審訊我記錄，我記得
經過審訊他們全承認是共產黨員和擔任的工作。有的供認作宣傳工
作有的供認作組织工作，有的供認作聯絡工作還有供認在反敵作戰
工作。其中有一個姓王的年在二十歲以上，南方口音持証中等身體較不
臉在審訊中承認是共產黨員做宣傳工作，他還供出別的人身份和擔任
的工作。還有姓張的女的年在十八九歲，南方口音持証身材不高，神
采奕奕說是共產黨員和訓練工作。

這起案件在審訊過程中我曾向被關獄法官候天津講過案件
情況。關於這起案件經過整理完詞稿，送給先生校對，差半送
到總隊了。

押犯陳新亞 1971年2月20日

注：①陈新亚笔供中所说的姓王的，据他所提供的面貌、特征
及担任的工作，即是指的王通。②陈新亚现在天津市。

特务总队侦缉士陈新亚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一年在英租界破获共产党的情况：

我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在伪天津市公安局侦缉队当侦缉士负责录供办稿工作，还有时参加捕人和审讯。于一九三一年四月由一队队长徐树铭照会英工部局带领队员在英租界办理一个共产党案件。办案前三天已派人化装在集贤里附近寻视。捕获十二三人为了继续捕人侦缉队留人卧底后陆续又捕五人所捕的人由工部局引渡到伪公安局押在拘留所。

在一队时由徐树铭和一队队附高松林审讯，我记录。我记得经过审讯他们全承认是共产党员和担任的工作。有的供认作宣传工作，有的供认作组织工作，有的供认作联络工作，还有的供认在工厂作罢工工作。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年在二十岁以上，南方口音，特证中等身量，体瘦，无脸，在审讯中承认是共产党员担负宣传工作，他还供出别的人身份和担任的工作。还有姓张的女的年在十八九岁南方口音，特证身材不高，白胖，无脸，承认是共产党员和联络工作。

这起案件在审讯过程中我曾向总队法官侯天铎讲过案件情况。关于这起案件经过整理讯词、拟稿、缮写呈文、校对、盖章送到总队了。

押犯陈新亚

1971年2月20日

(4)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伪天津市公安局破坏我地下党组织的“请奖表”(节录)

天津市公安局謹將擬具破獲共黨各案請獎數目列于左

卷之三

天津市公安局謹將擬具破獲共黨各案請獎數目列表恭呈		鑒核
原 辦共匪姓名破獲日期破獲地點	已 否	章情 實重輕微請獎全送辦機同
領深係等四名	此日張光遠 十九年十二月八日	第一伸範張光 特一等確羅
匪魁精騙	二十年二月九日	一千元部
范鄧至明	六處	半津衛改零 百錢
匪匪革革	三條石慈惠醫特一院五	已審實重委三〇〇元
匪匪革革	三月一日	院
匪匪革革	三月一日	副官
匪匪革革	三月一日	已審實重委一五〇元
匪匪革革	三月一日	已審實最重委二〇〇元
匪匪革革	三月十日	大平工社
匪匪革革	三月十日	已審實重委一〇〇元
呂祕書	三月一日	都文大學
富寶重委一〇〇元		

注：①表中划△处即是陈伯达等人被捕一案。②表中张任秋即蒲秋潮，已死。张系我党当时河北临时省委招待处负责人。③英租界集贤里当时是河北临时省委招待处。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与张任秋等一起在此处被捕。④表中证实，敌人对此案十分重视，奖金最高，达四〇〇元。

(5) 同案人刘宁一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见43页)

關於王通1931年在天津 被捕中的問題

河北临时省毛机关1931年4月8日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破坏，我们同时被捕的有许南兰、陈沅道、刘匪雄、蒲秋潮、鄭淑輝、李光标、胡大富、刘明升、梁光章、王通、孙找，共十五个人。从英租界巡捕房送到天津伪公安局，经过两次审讯，於九月初由北平法字良俗副司令部。

王通被捕后，一直是表现清况，特别是在伪看守所中多次向我表示，他身体不行了，连福如何替他想办法，营救他出去。

我们到天津伪公安局不久，在过第一堂时许南兰就叛变了。在过第二堂时梁光章第一个受审，敌人韓連云残酷逼指明法，他承认了是共产党员。

是保守交通，第二个是孙受审，说孙是
调来作交通的，我也承认是共产党员。
是调来作交通的，第三个是王通受审
至通回来谈，人同陈沉通谈，许菊芳
已经叛变，当面对质，無法抗拒；
全部承认了。那就是承认自己共产
党的身分，党的职务和来历，还供出了他
所知道的同案人的情况。敌人和
许菊芳是知道他是从苏联回来的，
他又是苏联的人当中第一个受审的，在他
受审之后，除王通外，其他的人都被破
人改掉了假名字，恢复了莫斯科时的
名字，这些名字只有王通知道，许菊芳
是不会知道的。

在王通受审回来之后，和陈锐
道大肆宣扬在许菊芳对证下只判
承认。于是全案突破。因此说明
王通在敌人面前承认投降全部小册子

我曾看到陈沉道在受审回来后，
连去两次寄东西。我问他寄什么？
他说，寄“口供。”他还说，“从苏联回
来的人和首要负责人都要寄”。我们同
意中从苏联回来的有，陈沉道、刘维雄、
蒲秋潮、鄭敬輝、刘明鼎、胡大富、王通
七个人。我问他寄什么内容？他说，
“寄什么时候入党，为什么入党，对共
产主义的认识等问题”。实际上是指
照敌人的要求寄材料或自首之
类的东西。

凌序一

1971.3.9.

同案人刘宁一的交代影印件原文

关于王通1931年在天津被捕中的问题

河北临时省委机关1931年4月8日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破坏，我们同时被捕的有许兰芝、陈沅（源）道、刘亚雄、蒲秋潮、郑淑梓、李德标、胡大富、刘明弗、吴光华、王通、和我。共十五个人。从英租界巡捕房送到天津伪公安局，经过两次审讯，于九月初送北平张学良伪副司令部。

王通被捕后，一直是表现消沉，特别是在伪看守所中多次向我表示，他身体不行了，无论如何替他想想办法营救他出去。

我们到天津伪公安局不久，在过第一堂时许兰芝就叛变了。在过第二堂时吴光华第一个受审，敌人韩连会张凯运指明后，他承认了是共产党员，是保定交通，第二个是我受审，说我是调来作交通的，我也承认了是共产党员，是调来作交通的。第三个是王通受审，王通回来后，向陈沅（源）道说，许兰芝已经叛变，当面对质，无法抗拒，全部承认了。那就是承认了自己共产党的身分、党的职务和来历，还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同案人的情况。敌人和许兰芝是知道他是从苏联回来的，他又是留苏的人当中第一个受审的，在他受审之后，除王通外，其他的人都被敌人改掉了假名字恢复了莫斯科时的名字，这些名字只有王通知道，许兰芝是不会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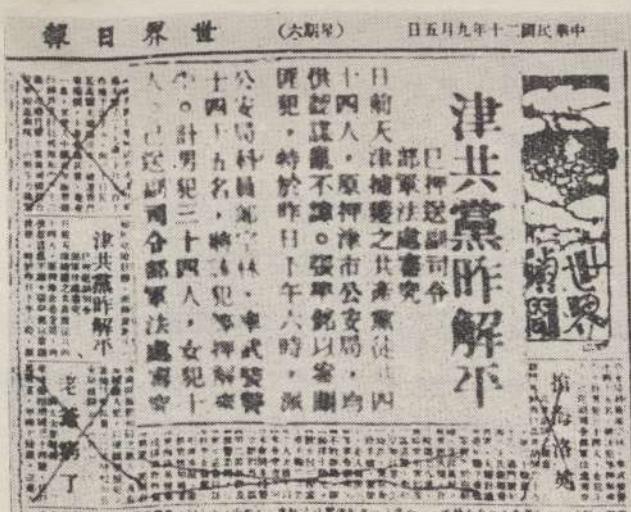
在王通受审回来之后，和陈沅（源）道大肆宣扬在许兰芝对证下只好承认。于是全案突破。因此说明王通在敌人面前乖乖投降全部交械了。

我曾看到陈沅（源）道在受审回来后，连出去两次写东西。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口供”，他还说，“从苏联回来的人和省委负责人都要写。”我们同案中从苏联回来的有，陈沅（源）道、刘亚雄、蒲秋潮、郑淑梓、刘明弗、胡大富、王通七个人。我问他写什么内容？他说，“写什么时候入党，为什么入党，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等问题”。实际上是按照敌人的要求写材料或自首书之类的东西。

刘宁一

1971.3.9

(6) 一九三一年九月天津《大公报》和北平《世界日报》关于陈伯达等人被押解北平的报导



注：周金铭即张晔。根据张晔交代，陈伯达是和他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初，一同从伪天津公安局押解北平行营军法处的。张晔现在山东省青岛市。

(7) 郁中复的证明

(影印件原文见下页)

关于营救王通出狱的情况

一九三一年十月间，我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到山西汾阳旧西北军军官学校工作。不久，陈君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赶到汾阳叫我设法营救党的负责同志。他说：党的负责同志王通由苏联回国后在天津被捕，现押在北平草炭子监狱，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设法营救出来。当时我们研究，我父亲邵斌山在北平是东北军的高级军官，由他出面作保有营救出来可能。于是，就给我父亲拍了一个电报。内容是：我的同学又係挚友王通因共产党嫌疑被捕，现押在北平草炭子陆军监狱，务乞设法营救出来。以后接到我父亲来信说，他亲自到监狱把王通保出来了。

一九五四年外贸部审干我受审查时，将营救王通的事情写上了。为了准备组织查问，我向我父亲做了较为详细地了解营救王通的情况。他告诉我：他接到电报后，到监狱找的典狱长，典狱长認為他是高级军官同意保释。并向他說：王通是留俄学生，是共产党誤入歧途能有認識还是有远大前程的。又說：犯人出狱要办手续，典狱长先到牢房叫王通写的改过书，他在保人的名单上簽名盖章。办完这些手续后，他就把王通领出监狱了。

邵中復



年二月二十日

注：①邵中复现在外贸部“五·七”干校。②陈君文又名陈文总，是陈伯达的结拜兄弟。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后投敌叛变，曾充当蒋匪第一军参谋长，解放后逃往香港。③邵斌山一九三二年是张学良的少将部副，已死。

邵中复的证明影印件原文

关于营救王通出狱的情况

一九三一年十月间，我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到山西汾阳旧西北军官学校工作。不久，陈君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赶到汾阳叫我设法营救党的负责同志。他说：党的负责同志王通由苏联回国后在天津被捕，现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设法营救出来。当时我们研究，我父亲邵斌山在北平是东北军的高级军官，由他出面作保有营救出来可能。于是，就给我父亲拍了一个电报。内容是：我的同学又系挚友王通因共产党嫌疑被捕，现押在北平草岚子陆军监狱，务乞设法营救出来。以后接到我父亲来信说，他亲自到监狱把王通保出来了。

一九五四年外贸部审干我受审查时，将营救王通的事情写上了。为了准备组织查问，我向我父亲做了较为详细地了解营救王通的情况。他告诉我：他接到电报后，到监狱找的典狱长，典狱长认为他是高级军官同意保释。并向他说：王通是留俄学生，是共产党，误入歧途能有认识还是有远大前程的。又说：犯人出狱要办个手续，典狱长先到牢房叫王通写的改过书，他在保人的名单上签名盖章。办完这些手续后，他就把王通领出监狱了。

邵 中 复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

(8) 一九三二年远锐写给河北省委的意见书(节录)

远锐致河北省委的意见书(节录)

1932.9.6
远锐致河北省委的意见书(节录)
在处理材料时遇到了问题，即在没有证据时绝对的不承认，有证据而不能推掉时，应该就轻避重的承认一点而有计划的开脱一些重要人。我们在公安局的口号一方面是“打死不承认”另一个是“有人对堂才承认”，所以第一堂除徐(许)兰芝外都能执行打死不承认(我们差不多到公安局一月后才过堂)，而当第二堂(又二十多天后)，因为有人证明，就差不多全体的并完全的承认了。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个教训，在没有证据的人虽然有人对堂依然有可能坚持不承认或只承认很轻的一小部分，所以“有人对堂才承认”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所以有些人在公安局的口供，差不多把自己全部的经过都(写)上了，真可以当传记读的！

远锐 九月六日

影印件原文

远锐致河北省委的意见书

在这里附带说到一个问题即在我们没有证据时绝对的不承认，有证据而不能推掉时，应该就轻避重的承认一点而有计划的开脱一些重要人。我们在公安局的口号一方面是“打死不承认”另一个是“有人对堂才承认”，所以第一堂除徐(许)兰芝外都能执行打死不承认(我们差不多到公安局一月后才过堂)，而当第二堂(又二十多天后)，因为有人证明，就差不多全体的并完全的承认了。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个教训，在没有证据的人虽然有人对堂依然有可能坚持不承认或只承认很轻的一小部分，所以“有人对堂才承认”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所以有些人在公安局的口供，差不多把自己全部的经过都(写)上了，真可以当传记读的！

远锐 九月六日

注：这是远锐一九三二年九月六日写给河北省委的意见书，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远锐在“意见书”中说：“有些人在公安局的口供，差不多把自己全部的经过都(写)上了，真可以当传记读的！”这个意见书也证实，陈伯达被捕后，投降了敌人，叛变了革命。

四、陈伯达出狱之后，写了一系列文章，积极进行反共宣传

陈伯达叛变出狱以后，积极进行反共宣传。除前面已经揭露的宣扬托派思想的文章外，陈伯达还写了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陈伯达在《论谭嗣同》一书中，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一文中，支持周扬一伙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在《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中，抛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同时，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倡议和鼓吹所谓“新启蒙运动”。一九三八年六月，他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狂热地吹捧蒋介石、汪精卫，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

(1) 陈伯达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写的鼓吹卖国主义的《论谭嗣同》(节录)

在西方資本主義的襲擊之下，變換了地球上的自然界，變換了社會，同時也變換了人類的思想。資本主義的威力，結果使矯石也溶化為漿乳，它不僅是把亞美利加，亞非利加，澳大利亞，南洋羣島……等各種有色人種從野蠻的狀態中解放出來，把他們和文明世界相接觸起來，使他們得呼吸一些所謂曰『文明』的風氣，同時是把那些文化發展較早，而在其某種特殊的歷史根基和條件之下，陷于停滯不振的國度和民族，從頑固死寂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使他們走進于新的『文化』的生機的道路上，如對於印度和中國。

在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對於外交的關係，分成聯日親俄二派；親俄者，是以李鴻章為首的『舊派』，而較之進步思想者，多主聯日。譚嗣同是屬於後者。就當時世界的歷史情勢看來，沙俄是世界上一切革命運動的憲兵，在東方，同樣地是最反動勢力的保壘，沙俄當時的企圖，是在於席捲華北，一面扼制黃色人種的覺醒，一面壓制自己國內的革命運動；因而進一步地與西方列強在世界上爭霸。所以當時中國『新派』的主張聯日，就整個世界形勢看來，是具有相當進步的意義的。沙俄的企圖，在一九〇五年，終於一面為日俄戰爭所擊碎，一面為俄國革命所擊碎。

注：陈伯达在《论谭嗣同》这本黑书中，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胡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从顽固死寂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的时候，陈伯达推销托洛茨基匪帮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反革命主张，鼓吹甲午战争后“联日”“是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的”，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

(2) 陈伯达一九三六年在《国防文学论战》上发表的反共文章(节录)

文學界兩個口號問題應該休戰

陳伯達

文學界兩個口號的問題，現在應該休戰了。爭論當然是不可免的，但爭論這樣長持下去，吃虧的只是自己，得到便宜的是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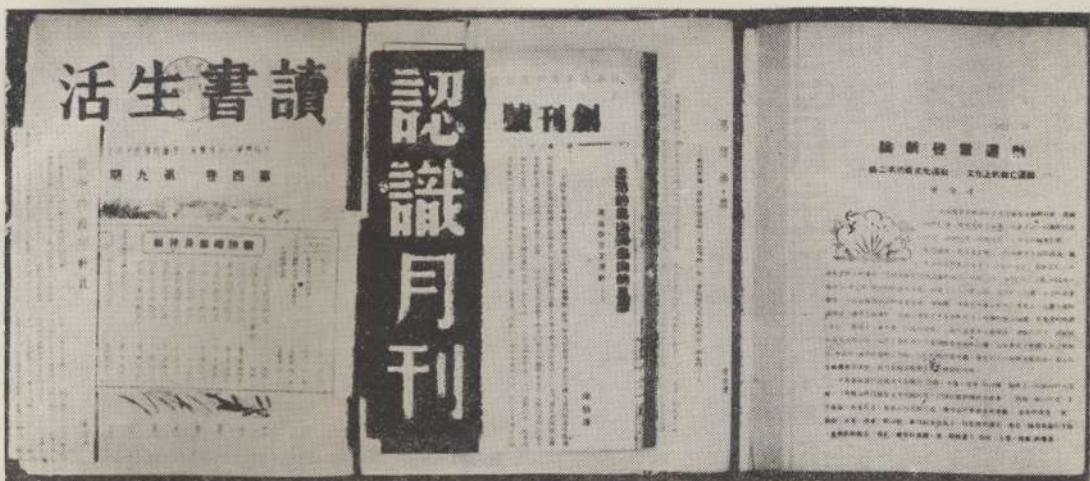
我認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不可駁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的人，也不能否認這口號的正確性。「國防文學」——這是聯合戰線的口號。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是左翼作家在「國防文學」下的自己立場，顯然地，這個口號，不是聯合陣線的口號。



注：陈伯达写的这篇反共文章，站在王明、刘少奇一边，支持周扬等“四条汉子”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3) 陈伯达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鼓吹“国防哲学”和
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反共文章



注：一九三六年，正当全国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抗日救亡而斗争的时候，陈伯达为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积极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倡议在全国发动一个所谓“新启蒙运动”，同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相对抗。

一九三六年九月，陈伯达同章乃器等人一起，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在这个特辑中，他抛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提出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并提出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到一九三七年夏，陈伯达连续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等十篇文章，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纲领。

陈伯达说：“新启蒙运动是‘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

“新启蒙运动所表现的方式，是思想的大解放。”“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要把四万万同胞从复古独断，迷信，盲从的愚昧精神生活中唤醒起来”。他鼓吹“新启蒙运动结合的标志，乃是保卫祖国，开发民智。”

他说：“我们哲学的任务，就是在于为保卫祖国而服务。”他还说：“在文学上，在一切艺术范围内，应该强调‘人的文学’，‘国民文学’，‘通俗文学’，‘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用这些口号把一切开明的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

他呼吁国民党当局帮助他们的这个“新启蒙运动”，并且力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

(4) 陈伯达一九三八年抛出的反共纲领《三民主义概论》



注：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

他在这本黑书中，抹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抹杀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

他在这本黑书中，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捏造历史，对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举行了十年“剿共”战争，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大汉奸汪精卫，奴颜婢膝地、恬不知耻地极尽歌颂吹捧的能事。他在摘引了蒋介石、汪精卫的言论之后接着吹捧说：“正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要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他长篇累牍地引用蒋介石、汪精卫的话，大肆捧场，竭力美化他们，为他们涂脂抹粉。

他在这本黑书中，还鼓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将这本黑书，托王明带到重庆出版，向国民党献媚。一九四六年八月，陈伯达配合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将“和平过渡”的反动谬论塞进《三民主义概论》，并将这本黑书再版抛了出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二年七月三日印发

共印二，〇〇〇，〇〇〇份